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
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

陈咏红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 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陈咏红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306 - 06399 - 1

I. ①周…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507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曾一达

责任编辑: 曾一达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潘弘斐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5.125 印张 64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咏红，女，广东省广州市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岭南、广府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唐宋讽刺寓言》（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有约30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等。2014年10月，参与撰写的《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全四册）》在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2—2013）评选中获著作类一等奖。

内 容 概 要

文士疏离现象指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士阶层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自我主体性实现途径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疏离行为和疏离精神。由王权或皇权的支配性所引发的“仕”本位意识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一。“仕”本位意识把是否为官、是否被统治者重用当成一种核心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文士疏离行为指文士规避显性功利（即入仕的利益）的行为；文士疏离精神指具有超越精神之士人的意识形态，是生命主体对此在世界主流观念、显性功利的规避与超越。文士疏离行为的内驱力是文士疏离精神，而文士疏离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文士的主体性需求。古代隐逸文化是文人疏离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本书包括绪论、上编、下编、结语与展望。

绪论首先展示了课题研究的意义，然后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概况，最后指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上编主要是对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作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分三章重点描述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其阶段性特征是新兴士阶层（主体是文士）主体性形成、高扬。第二阶段是秦至汉武帝时期。在这一阶段，儒生（文人即儒生）的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其阶段性特征是文士进行多元化价值观念和疏离方式的探索。第三阶段是汉武帝之后的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初步建立、专制制度成熟，其阶段性特征是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儒生（文人）追寻主体性的实现途径。在中央集权专制政制萌芽及发展起来之后，文人主体性的实现途径逐渐失落。历代文人一直寻求拥有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体现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四个构成因素，即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疏离文人的心态调适策略、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和交友休闲方式，至唐以前已全部产生，文人田园生活方式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性复归的路径。上编还阐述了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疏离“仕”本位意识的重要观点，以说明建立疏离理论、构成贯通古今的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体系的可能性。

在下编，本书专门研究文士疏离现象在周秦汉时期的文学表现。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文学表现的流变，与文士疏离现象演变过程一致，是文士疏离现象的组成部分。在下编的开头，“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被界定为一种文学品类和文学潮流，它是具有疏离精神的文学的省称，是由有较强主体性的文士共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的大文学，这些文学作品涉及诗歌、辞赋、史学著作、诸子散文等文体。疏离文学包含隐逸文学。至今尚未有人把“疏离文学”作为一种范畴文学加以系统研究。接着，从第五章到第九章，本书着重研究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文士疏离文学。

结语与展望部分对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作出整体性总结，并指出文士疏离现象对中国文人文学传统的三个主要影响：一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的“体道性”特征；二是在表现方式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三是在题材方面，强

化了文人文学以“自然”为背景和参照系的特征。

本书的主要学术意图是：一是从源头出发研究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凸显在文士疏离现象中文人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知识阶层主体性的共性；二是区分一般疏离主体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的文士（人）疏离主体，明确指出后来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其实是具有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疏离文化；三是描述文人主体性追求的指导思想即文人隐逸思想成熟于东晋以降的整个过程，并考察文人主体性需求对唐前文人生活方式各构成因素发展的指引作用，力求解决文人山水文学的起源问题。

关键词：周秦汉 文士 疏离 主体性 疏离文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	1
一、疏离主体指具有主体性的新兴文士	1
二、文士疏离现象的疏离对象是新兴文士的“仕”本位意识	7
三、新兴文士的疏离生活方式	2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22
一、中国古代文人隐逸现象真实性研究概况	23
二、疏离现象研究概况	41
三、文人主体性研究概况	43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45
一、主要难点	47
二、创新之处	48
三、研究方法	50

上编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

第一章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的生成和高扬	53
第一节 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	53
一、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的主要条件	53
二、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过程	65
第二节 战国时期新兴文士主体性高扬	72
一、战国时期的社会特征	72
二、战国时期文士主体性的高扬	73
第二章 第二阶段（秦至汉武帝时期）：士人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	83
第一节 士人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的状态	83
一、士人生活来源的不稳定状态	83
二、士人思想发展的不自由状态	87
三、士人创作动机的不寻常状态	99
第二节 士人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状态的主要成因	109
一、文官的权力一再缩小	109
二、士人可获得俸禄的地方越来越少	112
三、一般士人不易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117
第三章 第三阶段（汉武帝之后）：文人主体性实现途径的追寻	121

第一节 汉魏以降文人逐渐以田园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	121
一、汉代大庄园的产生,使文人得以多方探索体现主体性的生活方式·····	123
二、三国西晋时期庄园主身份的获得、庄园规模和功能开始多样化,文人可以获得土地·····	125
三、东晋南朝时期是庄园经济的成熟期,文人的田园日常生活哲学化、审美化·····	128
第二节 东晋以降,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三个要素形成·····	129
一、文人心态调适策略指向文人隐逸观念·····	129
二、学术独立倾向成为文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	132
三、一些逐渐独立的文艺项目成为文人休闲交友方式·····	135
 下编 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的流变研究	
第四章 春秋前传说性的文士疏离文学资源·····	139
第一节 《击壤歌》·····	139
第二节 《采薇歌》·····	143
第三节 《小雅·白驹》诗四章·····	144
一、马在周代受到尊崇,可以象征褒义事物·····	145
二、未成年的马驹能保有自由天性·····	146
第五章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	148
第一节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重要作品·····	148
一、诗歌类·····	148
二、散文类·····	153
第二节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特征·····	179
一、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179
二、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188
第六章 战国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	200
第一节 战国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200
一、诸子散文·····	201
二、《偕隐歌》·····	230
三、屈原赋所体现的新兴文士的主体性——以“玉”为中心·····	233
四、宋玉作品的文士主体性内涵·····	248
第二节 战国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的特征·····	257
一、战国时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257
二、战国时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284
第七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疏离文学·····	301
第一节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301

一、辞赋类·····	302
二、散文类·····	307
三、诗歌类·····	310
第二节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312
一、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312
二、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314
第八章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	316
第一节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316
一、辞赋类·····	316
二、散文类·····	337
三、诗歌类·····	341
第二节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341
一、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342
二、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345
第九章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	351
第一节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351
一、辞赋类·····	351
二、散文类·····	360
三、诗歌类·····	362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365
一、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365
二、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367
结语与展望·····	369
第一节 结语·····	369
一、学术价值·····	369
二、应用价值·····	369
第二节 展望·····	371
一、在价值取向方面,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的体道性成为后世文人文学 价值取向·····	371
二、在表现方式方面,文士的“怨”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 ·····	373
三、在题材特性方面,田园生活方式强化了文人文学以自然为背景和 参照系的特性·····	378
参考文献·····	383

绪 论

第一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

文士疏离现象指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士阶层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新兴文士疏离现象是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即否定形态,是维持社会均衡的力量。新兴文士疏离现象的基本构成包括三种因素:疏离主体、疏离对象、疏离方式。

本书的学理是,易道的“一阴一阳”说明事物具有对立性与和谐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①表示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与依存。因此,社会就是一个超级有机体(生命体),它具有自我平衡倾向。同理,随着王权在“三代”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在秦汉的发展,其主要对立面,即文士疏离现象也在发展。

本课题在提高我国古代文人隐逸文化研究理论水平方面有重要理论意义。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提高古代隐逸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平,拓宽其学术视野开阔度,具体表现为:本课题提出“疏离”概念,并以此为主线,展示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的发展过程,凸显周秦汉文士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知识阶层主体性的共性,并从一个崭新的高度看待、阐释传统的文人隐逸文化现象。

一、疏离主体指具有主体性的新兴文士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一直存在着一般性的疏离主体。例如,有些人因体弱多病、性格淡泊或存有害怕心理而对社会采取疏离态度。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兴文士群体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疏离主体。

新兴士群体的主要远源之一是“士”。士有两条发展线索:

一是与做“事”有关。早期的士是职事官之一种。《说文解字注》卷1上“士部”云:“士,事也。”^②士的职责始见于《书》卷3《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③帝舜命皋陶“作士”,担任刑狱之官。^④在夏代,士是六卿的一种。郑玄云,“所谓六卿者,

① 《易》卷7《系辞上》,〔三国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页。

②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段氏经韵楼丛书自刻本,第20页上。

③ 〔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0页。

④ 关于“士”的具体职务,《史记》卷1《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狱官之长”(〔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据清金陵书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顾颉刚等点校,第40页);《周礼注疏》卷34《秋官·司寇篇》郑玄《注》云“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者”(〔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67页)。

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也”，^①即“负责稼作的后稷、用于理民的司徒、管理祭祀的秩宗、训兵作战的司马、执掌刑罚的作士和从事建造的共工”。而所谓“六卿”即“六事之人”。《书》卷7《甘誓篇》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②可知夏启的所谓“六卿”即“六事”之人，亦指统帅天子六军之将。但正如《甘誓篇》之《正义》所云：

将战而召六卿，明是卿为军将。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周礼·夏官序》文也。……卿为军将，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郑玄云：“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军事，故“六事之人”为总呼之辞。

孔《疏》意为，六卿虽指统帅天子六军之将，但六卿“非六卿而已”，“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军事，故‘六事之人’为总呼之辞”。

在甲骨文、金文中，“事”和“史”“吏”“使”同字，这表明奴隶制国家初期（夏代），军事、行政官职未细分，“六事之人”泛指处理国家政务、军务的官吏。^③可以说，“六卿”应是同时兼有“统帅六军之将”义与“管理机构的六种职事”义的。文献也证明这一点。《书》卷7《胤征篇》引《政典》云：“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④此引文意谓，夏靠武力建国，军纪严明。军队行军早到迟到都算不及时，要遭受惩罚；而“士”正是负责用刑罚管理军民的。而“六卿”之一“司马”的职责也与军事相关，即“训兵作战”。故夏之六卿实为夏中央管理机构的六种职事，同时又是统帅天子六军之将。

而商士和周士已演变为宗法社会的贵族阶层，他们掌握一定知识，在管理机构任职，拥有食田。《大戴礼记》卷9《虞戴德篇》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⑤由此可知，老彭和仲傀皆商初贤臣，^⑥他们教授士行政知识。而周初统治者让殷士保有其原有宅地：“尔乃尚有尔土”，^⑦“宅尔宅，畋尔田”。^⑧

① 《礼记》卷4《曲礼下》，〔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261页。

② 〔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55页。

③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89页。

④ 〔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58页。

⑤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178页。

⑥ 老彭，王聘珍《解诂》引曰“殷贤大夫也”，并释曰“傀读曰虺”（〔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178页）。隐十一年《左传》（卷4）孔《疏》引杜预《世族谱》曰：“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35页）。

⑦ 《书》卷16《多士篇》，〔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20页。

⑧ 《书》卷17《多方篇》，〔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29页。

当时人分十等,^①士居于中,属最下层之贵族。

“先王”是如此培养“士”的:“是月,馀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②

二是与“文德”有关。周初统治者明确要求士有“德”。周公曾阐述留用殷士的标准:“予一人惟听用德。”^③可知周代用士以德为先。

而在周初到春秋中叶,“文人”名称也出现了,指“有文德的人”,与“小人”相对,与“君子”相类。“文人”一词最早见于《诗》卷18《大雅·江汉》“告于文人,锡山土天”;^④其中的“文人”意即“有文德之人”,即“文采与德行兼备之人”。春秋初期(前760)周平王所作《文侯之命》亦云:“追孝于前文人。”孔颖达《疏》云:“文人,文德之人也。”^⑤杨筠如《尚书覈诂》说:“追孝,古成语。《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是追孝之本义。引申为能继前人之志之意。”^⑥

综上所述,“有文德的人”这一“文人”概念在西周初以来就已应用,而这一概念最终演变为后世之“文人”概念,则有待“士”身份变得自由的春秋晚期的到来。^⑦

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和由商周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向官僚制的演变,^⑧上述两条线索于此时合而为一:原来的士阶层分化,摆脱了宗法等级,特别是原来血缘关系的束缚,其中一部分成员融合其他阶层人员,形成身份自由的贵庶混杂的新兴社会群体。新兴的“士”阶层包含从上层下降的贵族和从下层上升的平民。^⑨如孔子、墨子二者的身份就有差别。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他的学术思想推崇“礼乐”制度。而墨子则出身较为贫贱,在《墨子·贵义篇》(卷12)中,他自称为“贱人”。^⑩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反对“礼乐”。由于当政者大力提倡学文,“学士

①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昭七年《左传》卷44,〔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48页。)

②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第1122~1123页。

③ 《书》卷16《多士篇》,〔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20页。

④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573页。

⑤ 〔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54页。

⑥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4页。

⑦ 据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考证,《论语》时代语言中的“人”表示个体的人。(杨逢彬著,陈云豪校:《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9页)

⑧ 李世愉、孟彦弘:《中国古代官制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4页。

⑨ 以国人为主体的平民,包括庶人(士庶子之别支)、农、工、商四个阶层,与“贵族”相对而言。

⑩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清宣统二年(1910)重定本,孙启治点校,第441页。

则多赏”，^①故文士数量日渐增多，“士竞于教”。^②可见，春秋末年以后，“文士”崛起，渐成新兴人文知识阶层的统称。其中，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可称为“儒士”。《墨子》卷9《非儒下》云：“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③儒士在汉代影响最大，文士称为“儒生”，即读书人。

新兴“士”阶层形成的标志是：“士”形成了一定的主体性。^④新兴士阶层的主体性，主要指新兴士阶层在追求理想、与外界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⑤一般来说，作为主体的人，皆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发生的动力来自人的需要。“主体的人一方面受制于客体世界（自然和社会）和自身，另一方面还要力求认识、掌握、利用和改造客体世界和自身，并在实践中和它形成对象性关系，以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和社会精神需要。”^⑥由人的生理、精神、社会实践等方面的需要所构成的综合性内驱力，驱策人们去追寻、实现自己的需求。因此，这种综合性内驱力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而文士的主体性特别强烈。因为，文士智力水平较高，又掌握文化资源，因此，文士具有强烈的自觉认识和能动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并表现、确证和超越自己的潜意识和能动性。^⑦这种潜意识和能动性体现于文士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文士所擅长的社会治理活动和文艺审美活动中。新兴士阶层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其主体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意识^⑧；二是主体意识的表达方式^⑨。在秦汉以后皇帝集权的政治制度中，这种新兴士阶层的主体性实现的需求成为文士疏离现象产生的内在动力。疏离现象的发生，依赖于士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及其实现需求。“疏离”与“主体性实现途径的追寻”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在王（皇）权社会里，新兴文士群体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实现的需求，因此，疏离主体多为文士。

文士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文士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志于道”者方可称“士”。孔子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⑩后来，《说苑》卷19《修文篇》亦云“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⑪既然新兴“文士”自觉本阶层的

① 《韩非子》卷19《显学篇》，〔战国〕韩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四部丛刊初编影南宋乾道年间刻本，钟哲点校，第459页。

② 襄九年《左传》卷30，〔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42页。

③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清宣统二年（1910）重定本，孙启治点校，第307页。

④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2页。

⑤ 陈咏红：《“文人”概念起源考释》，载《广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81～84页。陈咏红：《唐前文人田园生活方式形成的四因素》，载《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第146～152页。

⑥ 张勤继：《司马迁与文学的主体性》，载《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1～2页。

⑦ 同上，第12页。

⑧ 主体意识含群体主体意识和群体成员的个体主体意识。

⑨ 本书第一章详述“主体意识的表达方式”。

⑩ 《论语》卷4《里仁》，〔三国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⑪ 〔西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9页。

“志于道”的属性，那么，新兴文士自然就有了一定的主体性，主体性的拥有标志着新兴士阶层的产生。

而文士往往以“立言”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实现的需求。春秋晚期，“立言”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被定为文人人生价值追求之一，并被赋予了永恒性。如襄二十四年《左传》（卷35）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①唐代孔颖达《疏》“立言”云：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

孔《疏》认为，“立言”涉及范围渐广，不仅包含子书、史传，而且还包含文章。不少新兴士阶层成员认为，凭借知识（立言）和行政能力出仕是士的人生正途。《墨子》卷2《尚贤上》说：“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②《孟子》卷6上《滕文公下》也载：“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③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立言高潮出现。

在汉代，“文人”等同“文士”，而文人或文士近同于儒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视法家，奖励军功，以吏为师；而汉承秦制，“明简易，随时宜”，^④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沿用秦制；在经济社会方面推行黄老之术，因此，汉初皇帝并不重视儒生。《史记》卷97《郇生陆贾列传》云：“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⑤但是，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文士”大致相当于擅长文章而有德行的读书人，即儒士。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7第五章云：“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⑥西汉刘安《淮南子》卷11《齐俗训篇》云：“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品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⑦由此可知，西汉时文士（儒生）擅写文章且有德行。

到东汉，王充《论衡》卷13《超奇篇》为“文人”等一系列概念下定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而“通人”不会写文章：“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⑧可知“文

① [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79页。

②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清宣统二年（1910）重定本，孙启治点校，第48页。

③ [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711页。《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学以居位曰士。”（[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第1118页）

④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颜注本，傅东华等点校，第722页）

⑤ [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据清金陵书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顾颉刚等点校，第2704页。

⑥ [西汉]韩婴撰，屈守元笺疏：《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598页。

⑦ [西汉]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东汉]高诱注本，第810页。

⑧ [东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606～607页。

人”和“鸿儒”都能写文章，“鸿儒”更能“精思”。《论衡·超奇篇》谈到“周长生”这个写了“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的“《洞历》十篇”的人时说，“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①下文又云，“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②。可知“文人”等同“文士”。王充《论衡·超奇篇》还指出“文墨辞说”是“士”的“胸臆”的表达：“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③但是，东汉应劭（约153—196）《风俗通义》卷9《怪神》之“文人”依然采用“有文德之人”之意。

凡变怪皆妇女下贱，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说，类复裨增；文人亦不证察，与俱悼慑、邪气承虚，故速咎证。^④

可见，此处的“文人”有维护社会正气的道德责任。

概言之，东汉时期“文人”的含义可谓二意（“有文德之人”和“擅写文章且有德行的人”）并存，而以后者较为多用。

汉魏之交，“文人”已成为一个称呼擅写文章且有一定道义的人的常用词，甚至可用以称呼古代文化人。如，《论衡》卷20《佚文篇》云“孔子，周之文人也”。^⑤《论衡》卷13《超奇篇》云“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⑥《文选》卷52《典论·论文》亦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⑦曹丕所指“文人”与后代相同。“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

而两汉以来，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增强，表现为：一是立言的文体更为丰富。文人们所立之言包括诗赋、子书、史传与论、策、疏等诸体应用体散文。二是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厚。淮南王刘安主张“文情相称”，司马迁提倡“发愤”著书，扬雄提及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王充提出“观文以知情”，^⑧王符主张“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刍尧虽微陋，先圣亦咨询”。^⑨可知，两汉文人借“立言”以达情的自觉意识增强，这是建安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前兆。

综上所述，与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意义相近的“文人”概念^⑩在春秋战

① 《论衡》卷13《超奇篇》，〔东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613页。

② 同上，第613～614页。

③ 同上，第609页。

④ 《风俗通义》卷9《怪神》，〔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8页。

⑤ 〔东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868页。

⑥ 同上，第614页。

⑦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重刻〔南宋〕尤袤刊本，第720页。

⑧ 《论衡》卷20《佚文篇》，〔东汉〕王充撰，刘盼遂集解，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870页。

⑨ 《潜夫论》卷10《叙录》，〔东汉〕王符撰，〔清〕王继培笺，彭铎师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465页。

⑩ 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91～204页。

国之际基本成立，在汉代走向成熟，即“文人”泛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人文知识阶层的成员。本书文士疏离现象的疏离主体即此种新兴文士。

二、文士疏离现象的疏离对象是新兴文士的“仕”本位意识

从政入仕情结，即“仕”本位意识，是新兴文士关于自我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的一种意识。毋庸讳言，在古代社会，知识适合的使用领域应是社会管治；新兴文士思想的主流也皆以“政治”为中心。如《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这既说明了新兴文士主体“诸子”学术的治世本质，也说明了新兴文士具有“仕”本位意识。

（一）“仕”本位意识的定义

“本位”是被人为制定为衡量其他现象的标准的特定现象。它不同于“本体”。本体和现象相对，是生成各种现象的本原，是本然地存在的。所谓新兴文士“仕”本位意识，是指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阶层意欲通过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可以提高王（皇）权政治统治、行政管理水平的思想文化资源，主持推行教化（政治社会化）手段，履行移风易俗、整合社会、规范王权从而从根本上捍卫王（皇）权政治的政治使命，以获取经济、政治资源，并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简言之，“仕”本位意识即以是否任官、是否把政治地位尊显当作评价文士社会价值或人生成功与否的根据的意识。在诸家之中，儒家从政入仕情结最为强烈。孔子虽然有时会产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②的感慨，但他与鲁君和权卿季氏保持着密切关系，始终没有走上隐逸之途。而孟子亦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③荀子则强调文士的正途是做官，而文士对于国君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荀子集解》卷4《儒效篇》云：“虽穷困冻餒，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④汉初，陆贾《新语》之《辨惑篇》亦云：“夫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⑤可见，“仕”本位意识乃文士关于自我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一种意识。

（二）王（皇）权的支配性引发了新兴文士的“仕”本位意识

新兴文士的“仕”本位意识主要是由王（皇）权的支配性引起的。王（皇）权的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据清金陵书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顾颉刚等点校，第3288～3289页。

②《论语》卷5《公冶长篇》，〔三国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473页。

③《孟子》卷6上《滕文公下》，〔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711页。

④〔战国〕荀况撰，〔清〕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清光绪十七年（1891）木刻本，沈啸寰等点校，1988年，第117～118页。

⑤〔西汉〕陆贾：《新语》，见《陆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1939年12月初版，1959年10月补印）丛书集成初编补印本，第22页。

支配性包含三个主要构成因素：在权力来源方面的王权神授观念的牢固性、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专制政体的集权性和物质利益方面的资源垄断性。可以说，王权神授观念的牢固性促成了新兴文士的思想依赖，专制政体的集权性导致了他们的制度依赖，王（皇）权的资源垄断性造成了他们的生存依赖。下面分述之。

1. 王权神授观念的牢固性促成了新兴文士的思想依赖

王（皇）权的支配性与神权有关。关于王（皇）权的权力来源，古人历来有王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具有牢固性。这是文士“仕”本位意识产生的思想原因。

（1）王（皇）权神授观念的牢固性的表现。

王权神授观念的牢固性表现为两点：

一是王权的权力来源自极具支配性的天或天神，这是难以有所改变的。古人十分重视人与神的关系，其祭祀的对象包括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其中，古人尤其重视人与天神的关系。远古时代，人们认为有一种神秘力量支配着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力量来自天或天的人格神上帝。天帝发布旨意被称为“命”或“降”等。天命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并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如，《尚书》卷16《周书·多士》云：“旻天大降丧于殷。”^①《尚书》卷15《周书·召诰》云：“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②《尚书》卷15《周书·召诰》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③《诗》卷1《召南·小星》云“实命不同”。^④西周时期，由天的命令引申出“命运”之义，而人获得天命的行为被称作“受”。如《尚书》卷15《周书·召诰》云：“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⑤经过这种从“命”“降”到“受”的过程，人便得到了天命，并自然地转化为自己的命运。显然，王（皇）权的权力也源于天或天帝，因此具有支配性和牢固性。为了表示自己受天命而王天下，突出王权的来源和地位，自西周康王以后，王者便号为“天子”。

二是王权常常利用祭祀的宗法性强化自己的权威。当需要祈求获得天命和祖先保佑、祈祷获得胜利时，人们都会举行一定的仪式即祭祀来进行祈求。在祭祀中，最重要的是“天地之祭，宗庙之事”。^⑥而主祭权掌握在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手中。因为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不仅具有本族的族权，而且具有部落战争的军事指挥权，因此，主祭权自然落入他们手中。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可谓集祭祀、宗族、军事大权于一身。《尚书》卷3《舜典》载，舜继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曾祭祀天地诸神：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

①〔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9页。

②同上，第212页。

③同上，第213页。

④〔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91页。

⑤〔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3页。

⑥《礼记》卷23《礼器》，〔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431页。